



СЕРИЯ ШЕДЕВРОВ 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20-ГО ВЕКА

20 世纪俄罗斯文学精品书系

诸神之死：叛教者尤里安

[俄罗斯] 德·梅列日科夫斯基 / 著

刁绍华 赵静男 / 译

北方文艺出版社



СЕРИЯ ШЕДЕВРОВ 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20-ГО ВЕКА

20 世纪俄罗斯文学精品书系

诸神之死：
叛教者尤里安

[俄罗斯] 德·梅列日科夫斯基 / 著

刁绍华 赵静男 / 译

北方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诸神之死:叛教者尤里安/(俄罗斯)德·梅列日科夫斯基著;刁绍华 赵静男译.--2版.--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2017.7

ISBN 978-7-5317-3853-4

I. ①诸… II. ①德… ②刁… III. ①长篇小说-俄罗斯-现代 IV. ①I5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89964号

诸神之死:叛教者尤里安

Zhushenzhisi Panjiaozhe Youlian

作者/[俄罗斯]德·梅列日科夫斯基
责任编辑/王金秋 赵芳

译者/刁绍华 赵静男
封面设计/安璐 张继星

出版发行/北方文艺出版社

网址/www.bfwy.com

邮编/150080

经销/新华书店

地址/黑龙江现代文化艺术产业园D栋526室

印刷/北京诚信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787×1092 1/32

字数/306千

印张/16

版次/2017年7月第2版

印次/2017年7月第1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5317-3853-4

定价/67.00元



想要关注本文集的读者将会发现，尽管各书的内容形形色色，有时甚至大相径庭，但彼此之间却存在着不可分割的联系。这是一条链条上的各个环节，是一个整体的不同部分。这不是好几部书，而是一部书，只不过是为了方便才分册出版罢了。这是一部书——讲的是一件事。

对于当代人类来说，基督教是什么？对这个问题的回答——这就是暗含在一个整体的各个部分之间的内在联系。提出问题采用各种各样的方式，答案也不尽相同，甚至存在着矛盾。假如我是一个布道师，我定会急于消灭它们，或者把它们藏匿起来，以便加强布道的力量；假如我是个哲学家，我定会努力按照一个想法走到底，最后达到寓单一于多样的明晰性，犹如光线通过水晶的

折射一样。然而，我既不布道，也不进行哲学探讨（如果说我有时难免做前者也做后者，那也是出于无意，甚至与自己的本意相悖）；我只不过是描绘自己一贯的内心感受而已，并且认为：这种描绘不管如何不完美，可是它们毕竟是过去有过的事的真实记录，自有其价值。因为我所发生过的事，许多与我同时代的人过去或将来也会发生；我过去和现在所感受的，许多人过去和将来也会感受到。基督教是什么？——不管当代人类如何回答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本身则是无法回避的。

矛盾会破坏系统性，会削弱布道的力量，但是却能肯定感受的真实性。不管完美无瑕的水晶如何诱人，还是应该认为植物的生长比它更好，尽管它并不完美，不均匀，与外界发生矛盾，并且内在不断地战胜矛盾。我不要追随者，不要门徒（上帝保佑，我现在没有，并且希望将来永远都不会有），我只希望能有同路者。我不说：你们到那里去；我要说：既然我们同路，那就让我们一道走吧。我知道：我要去的地方，不能一个人去。如果说在我所写的东西里存在着布道，那么也只有一种：鼓吹不应该有布道；不应该有一个引路者，而应该大家一起走。走出“地下室”，克服孤独——任务就是如此，如果说我的“手记”^①里反映了这项任务，那么这些“手

① 此处套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地下室手记》的标题。

记”就可能不无裨益。

我并不奢望给人们提供真理，但是我却希望：也许有人愿意跟我一起探求真理。果真如此，那么就请他跟我肩并肩地走那些崎岖曲折的、有时黑暗恐怖的道路；请他跟我分担我所感受到的矛盾痛苦，有时甚至是绝望的痛苦。读者跟我在各个方面都是一致的；如果我能从这些矛盾中解脱出来——那么他也一定会解脱出来。

举个例子来说。当我着手写作《基督与反基督》三部曲的时候，我觉得存在着两个真理：基督教是关于天上的真理，多神教是关于地上的真理，这两个真理将来要融合在一起——那就有了完满的宗教真理。可是，等我快要写完的时候，我已经知道了，基督与反基督的融合纯属亵渎神明的谎言；我知道，这两个真理——关于天上的和关于地上的——早已在耶稣基督身上，在神子身上融合在一起了，普天之下的基督教所信奉的那个唯一真神身上体现出来的真理，不仅是完美的，而且也是不断完善的，不断成长的，永无止境，除此之外，再就没有别的真理了。但是，现在我还知道，我必须把这种谎言坚持到底，那样才能看见真理。从一分为二到合二为一——这就是我所走的道路，与我同路的读者，如果他在主要方面——在自由的探索中与我一致，也必定会走到同一个真理上来。

再举个例子。当我写作研究著作《列·托尔斯泰与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时候，我在俄国专制制度中，具体地说，在它与俄国东正教联系中看到了，或者说，我想要看到正面的宗教力量。也跟弗·索洛维约夫^①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样，尽管是由于完全不同的原因，我觉得俄国的独裁制度是通向神权、通向尘世天国的途径。我在这方面是始终如一的：我主张在宗教方面把基督与反基督结合起来，从而在社会生活中也应主张二者的结合。可是，写作《未来的含^②》和《俄国革命的先知》时，我已经知道，俄国独裁制度的宗教力量的确是巨大的，但并不是正面的，而是一种反面的、魔鬼的力量。我还知道，不理解这种力量，面对它闭起眼睛，不善于重视它——这是俄国革命历次失败的主要原因。与旧秩序的斗争只要是单纯地局限在政治平面上，像迄今为止所进行的那样，它就不可能以胜利而告终。革命本来是与长着翅膀的猛禽斗争，可却以为是在与四条腿的猛兽斗争。革命本来是尘世的，而它的敌人都不只是尘世的。这就是为什么革命会如此奇异而又软弱地失掉了武器。对敌人的打击虽然穿过了他的躯体，但是并没有伤着他，就像用剑击幽灵一样。

① 弗·索洛维约夫（1853—1900），俄国哲学家和诗人，对俄国文学的象征主义思潮产生了重要影响。

② 含，《圣经》中挪亚的儿子，洪水期间登上方舟而得救，后来对父亲不孝。

让我得出这种认识，使我睁开眼睛来观看俄国独裁制度的，不仅仅是对世界性的基督与反基督斗争的历史观照，而且还有我个人内在的宗教经验和俄国生活的外在事件。如果读者在我的这些想法上经不住诱惑而同意我的意见，那么也会跟我一起战胜这种诱惑。我还知道一点：不彻底地认识诱惑，就不能战胜它。

例子已经够了。我担心所说的这些已经束缚了读者的自由。我再重复一遍，请我的同路者跟我并肩而行，如果他们愿意并且能够这样做；而如果不是这样，那就放弃我——我不会拉着他们跟我走。

最后，我试着给我所写的东西提供一个最简要的概括说明。

三部曲《基督与反基督》描写的是两种本原在世界历史上的斗争，这是过去的斗争。《列·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俄国革命的先知》《莱蒙托夫》《果戈理》——描写的是俄国文学中的这一斗争，这是现在的斗争。《未来的卑贱者》《不是和平而是刀剑》《在平静的漩涡里》《病态的俄国》描写的是俄国社会生活中的这种斗争。《古代悲剧》《意大利故事集》《永恒的旅伴》《诗集》则以路标的形式记下了把我引向一个唯一的包罗万象的问题的各条旁系道路，这个问题就是关于两个真理——神的与人的——在神人显现中的关系。最后，第二个三部曲——《保罗一世》《亚历山大一世》

《十二月党人》^①（后两部正准备付印）——则从这两种本原的斗争对俄国未来命运的关系的角度来探讨这种斗争。

这当然只是一个外在的、死板的示意图，是一个迷宫的几何草图；至于构成活生生的植物生长的内在结构，我本人恐怕比别人知道得少。我只知道，我并不想构建什么——我想要成长和培育；至于是否成功了，这不该由我来评判。

我知道，在我的同时代人中间，与我同路的读者并不多。然而，我并非孤身一人。要是没有与我亲密的人的帮助，没有同一信仰的亲密者的帮助，我就连已经做出的微小成就都做不出来。如果只能指望同时代人，那么从事宗教事业的人不管他们如何谦逊，都根本不会干这种事。我们栽种圆白菜是为了自己，而栽树则是为了子孙后代。

我想要把我的劳动——我们的劳动——奉献给那一代俄国人，他们会理解，基督教不仅过去存在过，而且现在和将来都会存在；基督教不仅是完美的真理，而且这真理不断完善和不断成长，无尽无休；俄国的解放，世界的解放，不可能不以基督的名义进行，别无其他的名义。

① 《十二月党人》，又称《十二月十四日》。

德·梅列日科夫斯基及其

长篇三部曲《基督与反基督》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是俄国文学的“白银时代”，名家辈出，各种思潮流派争奇斗艳。德米特里·谢尔盖耶维奇·梅列日科夫斯基（1865—1941）就是这个时期俄国文学的杰出代表之一，他作为俄国象征主义的开创者和重要代表人物，既是著名的理论家，同时在诗歌和小说创作中也取得了辉煌的成就。然而，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梅列日科夫斯基跟“白银时代”的其他作家一样，尽管在西方享有盛誉，而在其祖国却被当成“颓废派”长期受到冷遇。近年来，梅列日科夫斯基终于从尘封的历史中被“发掘”出来，他的小说重新放射出艺术的光彩。

—

梅列日科夫斯基生在一个官吏家庭，1884年入圣彼得堡大学历史语文系学习。他的第一首诗发表于1881年，

早期诗作收在《诗抄》(1888)中,流露出悲观主义情调。他在大学时代曾受到孔德、斯宾塞等人影响,但九十年代初则否定了实证主义哲学,在世界观上开始倾向于宗教。1889年,梅列日科夫斯基与女诗人季·吉皮乌斯结婚,二人在文学创作和宗教探索方面志同道合,共同生活和合作了五十余年。1901年,梅列日科夫斯基夫妇在彼得堡创建“宗教哲学俱乐部”,企图把东正教与天主教融合起来,把东方的“神人”与西方的“人神”结合在一起,创造了一种“新基督教”。这实际上是一种基督教人道主义哲学,与俄国官办教会的利益背道而驰,因此“宗教哲学俱乐部”于1903年4月5日被圣主教公会查禁。但梅列日科夫斯基夫妇后来一生都没有放弃宗教哲学探索,并且把它与文学创作紧密结合在一起。

俄国文学中的象征主义是在俄国哲学中的“宗教复兴”直接影响下产生的。十九世纪末,由于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社会矛盾的加深和官办教会的腐化堕落,思想界出现一个以符·索洛维约夫等人为代表的宗教神秘主义哲学学派,企图进行“宗教复兴”,倡导基督人道主义。梅列日科夫斯基受到符·索洛维约夫的思想影响,认为在不可避免的死亡面前一切都是微不足道的,因此人生的唯一价值在于“对奇异的永恒追求”。他在1892年出版诗集《象征集》,这是俄国象征主义在创作实践中的第一次尝试。后来,他又陆续发表诗集十余部,如《太

阳之歌》(1894)等。1892年,梅列日科夫斯基发表著名的理论著作《论当代俄国文学衰落的原因和新思潮》,提出“新艺术的三要素:神秘主义的内容、象征和艺术印象的扩展”,成了俄国文学中象征主义流派的纲领。后来,他又出版论文集《永恒的旅伴》(1896)和大型研究论著《列·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1901—1902),进一步阐述了象征主义的理论体系。俄国象征主义虽然带有浓厚的宗教神秘主义色彩,但反映了时代的精神危机,是对资产阶级平庸的日常生活及其腐朽没落的道德原则的否定,体现了历史大变革的某些预感。

如果说法国象征主义者主要在诗歌领域耕耘,那么俄国象征主义除了诗歌之外,在小说方面也取得了空前的成就。梅列日科夫斯基在俄国象征派中率先涉足小说,尤其是在长篇小说的创作中更是独树一帜,既发展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传统,同时也体现了象征主义的基本原则。1893年,他着手写作《基督与反基督》,这是一套三部曲,包括《诸神之死:叛教者尤里安》(1896)、《诸神的复活:列奥纳多·达·芬奇》(1901)和《反基督:彼得和阿列克塞》(1905)三部长篇小说,前后历时十二年才完成,发表后给他带来了广泛的声誉。

1905—1914年间,梅列日科夫斯基侨居巴黎,但作品照旧在俄国刊行。他先后出版两套全集:1911—1913年为十七卷本,1914—1915年为二十四卷本。1908—

1918年，他又完成第二套长篇三部曲《野兽王国》，包括阅读剧《保罗一世》（1908）、长篇小说《亚历山大一世》（1913）和《十二月十四日》（1918）。作家没有接受十月革命，1920年初逃离苏俄，取道华沙，流寓巴黎，1941年在那里逝世。国外流亡期间，梅列日科夫斯基又发表十多部历史小说，例如《陌生的耶稣》（1932）等，这些作品也利用长篇的形式，反映了作者不懈的宗教哲理探索。

梅列日科夫斯基一生著述极其丰富，《基督与反基督》不仅是他的小说创作的顶峰，而且也是俄国象征主义长篇小说的重要代表作。这套三部曲在题材和情节上彼此之间毫无联系，每一部都各自独立成篇，但却贯穿着一个共同的主题，正如标题所显示的，这就是“基督与反基督”。梅列日科夫斯基写道：“当我着手写作《基督与反基督》三部曲的时候，我觉得存在着两个真理：基督教是关于天上的真理，多神教是关于地上的真理，这两个真理将来要融合在一起——那就有了完满的宗教真理。可是，等到我快要写完的时候，我已经知道了，基督与反基督的融合纯属亵渎神明的谎言；我知道，这两个真理——关于天上的和关于地上的——早已在耶稣基督身上，在神子身上融合在一起了，普天之下的基督教所信奉的那个唯一真神身上体现出来的真理，不仅是完美的，而且也是不断完善的，不断成长的，永无止境，

除此之外，再就没有别的真理了。”^①这段话是理解《基督和反基督》三部曲思想的钥匙，“基督与反基督”作为贯穿三部曲的共同主题，在不同的作品中得到了不同的体现。

西方文化起源于古希腊罗马，基督教产生以后彻底取代了古希腊罗马的多神教，并且在中古时期独霸欧洲的意识形态长达一千多年，直到文艺复兴时期才首次受到冲击。文艺复兴运动是一场资产阶级思想文化运动，确立了人文主义理想，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在思想上扫清了道路。但是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人文主义思想也越来越多地暴露出自己的局限性，到了十九世纪末，资产阶级个性解放的理想已经完全破产。梅列日科夫斯基并没有科学地理解这一历史进程，而用基督教学说来解释社会的发展，把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矛盾皆归之于基督教的衰落。他把真善美对立起来，摈弃了美的追求和个性解放的理想，热衷于抽象的真与善，反对假与恶，认为基督和反基督的斗争是永恒的，在人类历史发展的转折关头则尤为尖锐激烈。因此，“基督”和“反基督”在梅列日科夫斯基笔下既是基督教和多神教的寓意形象，同时也是两个概括更加广泛的社会哲理性的象征。

^① 《〈德·梅列日科夫斯基〉序言》，载于《德·梅列日科夫斯基全集》第一卷，莫斯科1914年版，第8页。

《诸神之死》起初题为《被摈弃者》，1902年第二版改为现在的书名。这部小说取材于罗马帝国的历史，反映了基督教和多神教的残酷斗争，刻画了罗马皇帝尤里安的悲剧形象。

弗拉维乌斯·克劳狄乌斯·尤里安（约331/332—363）是罗马皇帝君士坦丁大帝（约3世纪80年代晚期某年—337）的侄子，他的父亲君士坦提乌斯·尤利乌斯被后来当上皇帝的君士坦提乌斯（317—361）杀害。尤里安自幼成为孤儿，初由尼科米底亚主教欧塞比乌斯秘密抚养，后去小亚细亚的卡帕多细亚省马萨鲁姆城堡藏身。他一方面对当朝的皇帝怀着深仇大恨，另一方面又生活在胆战心惊之中，随时随地都害怕自己被杀。十九岁那年，他获准外出游学，先后到过帕加马、以弗所、雅典等地，深受新柏拉图学派的影响，355年被君士坦提乌斯立为副帝（恺撒），尤里安加冕后不久奉命出征高卢，英勇善战，击败了阿勒曼尼人和法兰克人，但他的战绩却引起君士坦提乌斯的嫉恨。360年，正当他在巴黎（琉提喜阿）越冬时，皇帝下令抽调他的精锐部队到东方作战。部下拒绝执行，拥戴尤里安为皇帝（奥古斯都）。君士坦提乌斯率兵讨伐尤里安，但途中病死于塔尔苏斯城，死前无可奈何地同意把帝国传给尤里安。尤里安登基以

后办了两件大事：一是宣布宗教自由，企图恢复古希腊的多神教；二是想要重建罗马帝国在东方的霸权，363年率领六万大军东征波斯。这两件事紧密联系在一起，相互影响，最后皆遭失败。反基督尤里安兵败泰西封城下，溃退途中被敌人投枪刺穿肝脏而死。信奉基督教的约维安成了他的继承者，基督教徒欢庆胜利。

尤里安在历史上被基督教会宣布为“叛教者”（即曾经受洗的基督徒公开全面否定基督教义的人，除受教会法制裁外，还要受世俗法处罚），欧洲文学作品凡是描写他的几乎都对这个“叛教者”进行谴责（恐怕唯有易卜生的剧本《皇帝与加利利人》例外）。而《诸神之死》却把尤里安刻画成一个悲剧性的英雄，对他充满同情。小说从尤里安的童年写起，描写了他一生的活动。这位君主在基督教产生三百年以后宣布宗教自由，企图恢复古希腊时期的多神教，因为他憎恨君士坦提乌斯及其所代表的基督教文化，推崇古希腊艺术，把奥林匹斯诸神视为美的理想的体现、力量的源泉。

基督教教义作为“关于天上的真理”，主张摒弃人世的欢乐，扼杀人性，冷酷无情。苦行长老迪迪穆斯：“有人若是愿意跟随我而不恨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兄弟姊妹和自己的生活，那他就不能成我的门徒。”而作为古希腊文化的基础的多神教则是“关于地上的真理”，体现了人的现实生活需求，给人以美，给人以力量。马

克西穆斯向尤里安指出两条道路让他选择：“假如你相信他，——你就拿起十字架，像他吩咐的那样跟随着他。做个恭顺的人，无邪的人，当刽子手手里无声无息的羔羊吧；跑到荒原里去；把自己的精神和肉体都贡献给他；忍耐，信仰。”另一条：“成为强者和自由人：不要怜悯，不要爱，不要宽恕；起来战胜一切；不要信仰，也不要认知。世界将是你的。”尤里安在阿佛罗狄忒的祭司奥林匹奥多罗斯家中得到了亲人般的温暖和关怀，他为阿佛罗狄忒女神的美丽所倾倒。他对奥林匹斯诸神的崇拜，与他贪婪地享受人生的欢乐密切相关。然而，对于尤里安来说，最主要的则是古代多神教可以赋予他以力量和勇敢，使这个富于幻想、意志坚强的君主有可能摒弃基督教所鼓吹的恭顺和解，而与敌人进行殊死斗争。尤里安“想要像古代埃拉多斯男儿那样快活”，而且“想要成为强者和像恶魔一样令人生畏”，为此就不能不弃绝基督教而求助于多神教。这只“披着驴皮的狮子”准备伸出利爪，他要像历史上敢于刺杀恺撒的布鲁图那样，向君士坦提乌斯报仇，并且进而改造整个世界。

但是，梅列日科夫斯基却认为真善美不可能和谐一致，不可能综合在一起。古希腊的多神教是美的体现，与基督教的善根本相对立，因此在本质上是反基督教的。尤里安使古代神祇复活的种种企图不仅荒唐可笑，而且必遭失败，因为已经退出历史舞台的多神教注定要灭亡，